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朱哲 主编 ●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

变迁与创新

潘 晔 著



●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朱哲 主编●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

变迁与创新

潘 晔 著

●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与创新/潘晔著.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9-2826-3

I. 中… II. 潘… III.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研究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3530 号

出版发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 号 邮政编码:430070)

<http://www.techbook.com.cn> 理工图书网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50×980 1/16

印 张:18 插 页:4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定 价:32.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电话:(027)87397097 87394412

E-mail: lulip@whut.edu.com

校长寄语

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人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的中心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而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大学为此承担着神圣的使命。

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坚持科学真理、追求科技进步最重要的知识殿堂，但直至 19 世纪以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才在大学得以最终确立，大学逐渐从象牙塔走近社会的中心，成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基地，发挥着辐射新观念、发明新科技、拓展新产业、提供新信息等强大的社会功能，引领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代大学这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使大学的科技工作成为联系学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知识创新、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的桥梁，从而推动现代大学逐步走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前沿，为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大学自身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大学的发展历史表明，科学研究始终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职能。

大学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创造新知识、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性精神、不断创造更优秀的文明成果。没有领先的学术方向、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科研教学成果、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基地，就不会有一流的大学。

一所大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我认为，一个学校的大学文化，首先是追求真理，追求理想，同时要崇尚学术、严谨求实，还要敢于批判，敢为人先；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整体精神面貌。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建设的重要性，要努力凝练我们的大学文化，培育我们的大学精神，这就需要科技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协调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掌

握和运用哲学社会科学一般原理和方法去思考和研究人生和社会的问题，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我国政治优势之所在，为我们加强和改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大的理论思想武器。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努力培养一代既有求是、求真科学精神，又洋溢诗情、充满人文关怀意识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科学是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强有力的杠杆，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明最深刻的内涵；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愿我们不骛虚华，以踏实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大学文化的凝练和大学精神的培育，为实现我校“整体水平国内一流，部分学科水平国际一流”的多科性、开放式、有特色的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而投身于科学研究中。愿我们以此共勉。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

周祖德

2008年1月

总序：超越历史间距

转眼之间，历史的车轮已驶入新世纪的第八个年头，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回眸 20 世纪，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学说那样，对现实历史和人类生活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在世纪之交，在西方媒体的一系列千年伟人的评选中，马克思均名列前茅。在过去的千年中，各个领域的思想大师可谓群星璀璨，而马克思却独领风骚。这一事实，直观地表明马克思以及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主义所具有的无穷的思想魅力及其超越性的意义。

实际上，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包括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已经体认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对现当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 19 世纪而又超越了 19 世纪，且与时俱进的伟大理论。福柯认为：在现时，研究历史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詹姆逊亦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德里达则断言：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2005 年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加里斯特·琼斯曾对马克思荣登千年哲学家榜首一事评论说：如果你读《共产党宣言》，你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很有力、很了不起的文献，虽然出版于 1848 年，但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全球化、裁员、跨国公司、世界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所有这些内容书中都能找到，它有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其它任何文献都没有这个力量。

应该说以上的这些评价是客观公正而真诚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无论是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还是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消解，均以失败而告终，都显得苍白无力。历史一再表明，那些试图埋葬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最终都被马克思主义所埋葬，因为，在生存原则（如以

“资本”为生存原则)未发生根本转变的现当代文明中,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客观而深刻的本质是不可能被撤消的。这种深入到历史运动核心并由此展现出长久理论活力的思想,只有在现实的“实现”中才能够被“扬弃”。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今天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在改革开放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的今天,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并未像当初有些人担忧的那样离我们而去。相反,我们开始真正理解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过渡的时代,真正理解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极端重要性,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真实含义……总之,马克思主义仍具有超越历史间距的令人震撼的力量。史无前例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日益推进,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这为我们重读和重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

囿于识见和学养的缺陷,我们的见解和体会未免有些肤浅和狭隘,但是我们的解读是认真的,我们的思考是严肃的,我们的态度、立场是端正的。而马克思主义广泛而长久的理论活力不正是在一代代人的认真解读、严肃思考与努力实践中获得的吗?这套丛书正是我们认真解读、严肃思考的结晶,当然这也是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学科建设中积极践行“学术至上”、“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的结果,是我们为建设研究型大学而努力的体现。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我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我们的这些解读、思考和把握是否更加贴近马克思主义或更加远离马克思主义,只有留给读者诸君批评了,我不否认这套文库中存在缺陷、成见和错误,我们只有在今后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去追求完善,但我们也知道理想目标的完美性与达到它的可能性之间的距离。“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语)

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朱哲

2008年1月

序

潘晔博士的学位论文即将出版，这是她花费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终于能够成书，谨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个特殊问题”，始终与党的事业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国家的强弱，经济发展的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质量和数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强调：“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均十分重要，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都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如何正确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一直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我们党执政以来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课题。但是从以往的相关研究来看，对知识分子本身的研究成果占绝大多数，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系统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潘晔同志 2003 年考入武汉大学，主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她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与创新为研究课题，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进程。经过刻苦努力，她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赞许，给予很高的评价。后来，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补充修改，形成专著。她通过对党自成立以来 80 多年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考察与回顾，总结出了许多成功的历史经验及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我们党今天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的特点，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等提供了经验借鉴和重要启示。在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今天，她的研究无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潘晔博士的这部著作，主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思想为指导，沿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经典分期，从文本研究出发，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较详尽的历史考察，从中总结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迁与创新中，揭示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功效，力求对党的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公正、全面的评析。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现在和追求未来，通过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思想作深入分析，揭示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全面贯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人才强国战略；同时该著作对新世纪新阶段在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导下，我们广大知识分子自身应如何克服弱点，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切实担负起今天在知识经济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合理化的建议。

我对潘晔博士在学术与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由衷地感到欣慰。她勤奋好学，刻苦努力，积极上进，相信她会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更加努力，诚挚地希望她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经过不懈的努力与奋斗，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孙居涛

2008年1月于珞珈山

目 录

导 论 /1

- 一 知识分子及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内涵 /1
- 二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的现状以及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意义 /7
- 三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体系结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13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及其基本经验 (1919—1949) /17

- 一 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早期探索 (1919—1927) /18
-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27—1937) /40
- 三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37—1945) /56
- 四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46—1949) /81
- 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迁的基本经验 /93

第二章 过渡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 (1949—1956) /98

- 一 中国共产党从执政的角度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新探索 /99

- 二 过渡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 /103
- 三 过渡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评析 /131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经验教训（1957—1978） /136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头十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跌宕起伏（1957—1966） /137
- 二 “文化大革命”十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被严重扭曲 /159
- 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教训 /173

第四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新发展（1978—2000） /184

- 一 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新发展的背景 /185
- 二 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2
-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创新发展 /207
- 四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新发展的绩效分析 /217

第五章 21世纪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构建 /222

- 一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新构建的重要性 /223

二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新构建的主要内容	/239
三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创新	/256
	结束语	/261
	中外文参考文献	/267
一	中文参考书目	/267
二	中文参考文章	/273
三	英文参考书目与文章	/275
	后记	/276

导 论

知识分子及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内涵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的现状以及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意义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体系结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一 知识分子及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内涵

知识分子属于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定大不相同。

西方人谈论知识分子一般可追溯到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 19 世纪 40 年代起源于波兰和俄国的“intelligentsia”一词，是特指当时在波兰和俄国的社会中出现的一批醉心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奋力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有识之士。另一个源头是 1898 年克雷孟梭（Clemenceau）在描述联名抗议法国军方制造冤狱迫害退役军人德雷福斯（Dreyfus）的法国知识界人士时，创造出“intellectuals”^①一词，主要是称颂他们跨越职业界限，凭借良心、理性和知识来打抱不平、仗义执言的义举。这一词语随即流行开来，

^① Aleksander Gell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Intelligentsia. In: Aleksander Gella, ed.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Intellectuals: Theory, Method and Case Study. Sage, 1976, p 9—34.

远指古希腊时代那些充满智慧的哲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和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人士；近指具有道德良心、普遍理性和丰富知识，并且运用这种良知、理性和知识来干预社会政治事务的所有人士。总之，“‘知识分子’在西方更多的是特指那些在大学受过教育，受西欧文化的教养，自成一个有别于传统阶级结构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从贵族家庭、地主阶级或富农的子弟中吸收成员，他们脱离旧有社会，由于相同的知识背景，而且对于既定的社会所采取的态度又相同，他们自觉联合在一起，这一切再加上新科学的精神与自由解放的概念，使他们倾向革命”。^①可见，西方“知识分子”的两个词源虽然在出现的时间和空间上不同，但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承认知识分子具有现代知识，对社会保持强烈的批判意识。后来西方很多学者将这一点当作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和历史使命，并主要从这一点上来界定知识分子。

对中国而言，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词，这个词的意思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士”，但两者也不完全相同。士大夫可称得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但士大夫本身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而更主要的是属于官僚阶层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体而言，中国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差异主要有三点：第一，中国的“士”一向以儒家思想为知识的内容核心，注重伦理道德，关心人与人、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士”讲究的是行为规范及人格风范，所谓“士不可不弘毅”就是一个典型的风范象征。第二，中国传统的“士”并不是来自于一个社会阶层，尤其是在中国过去科举制度下的“士”，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虽有特殊社会地位，却未能形成一个明显独立的社会阶层。维系他们的仅仅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对人生理想的认同倾向。第三，中国的士大夫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了现存体制。从历史考察的情况来看，中国使用“知识分子”一词大约是始于

^① 雷慕德·阿伦：《知识分子的鸦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湾）1980年版，第263页。

“五四”时期。从那时起，中国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社会政治舞台。^①

1949年以前，在中国“智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基本是同义的，在一般的情况下，对这两个词的使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五四”时期为中国人创造了许多新名词，将读书人称为“知识分子”或“智识分子”应该算是其表现之一，一直沿袭至今。从“五四”时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知识界和共产党人的词汇里，凡是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可称为知识分子。虽然有时也作小知识分子、中等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划分，但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读书的人很少，所以在那时候中国基本上把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其对象就包括受过小学教育的读书人，也包括正在读书的各类学生。而后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普及，读书的人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资格也就被提升到指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原来属于“小知识分子”和“中等知识分子”的那些人士已经不再在知识分子的范围。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是有所不同的。在20世纪30年代，对具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就称为知识分子。50年代，知识分子是指国家统计局按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并从事脑力劳动的标准来统计知识分子的。80年代，把中等专科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作为界定知识分子文化程度的统计标准。随着社会生活对知识需要程度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社会已经把作为知识分子必要前提的学历提高到大专水平。新版《辞海》解释说：知识分子是指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从这个定义出发，知识分子是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并且拥有较多文化知识的人。在中国人的语言实践中，“知识分子”当然是“知识

^① 李小宁：《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

多的人”，说一位知识渊博但不关心社会命运或人生意义的中科院院士不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会觉得不可理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脑力工作岗位的不断增多，必须对知识分子概念作进一步的界定，不能只停留在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说明和指出是脑力劳动者这两个方面。在众多的界定中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理解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主要是指学历）的角度来看，我国80年代在政策上规定凡是中专以上的毕业生都算是知识分子；第二层次，从脑力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主要以是否从事脑力劳动作为断定是否为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这是大多数人目前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标准；第三个层次，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角度看，主要以是否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作为断定是否为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这是现代意义上对知识分子的主要评判标准，也是目前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评判标准。因为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化和脑力劳动者数量的日益增多，人们发现以高等学历与脑力劳动作为断定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已不太合理，而且在政策把握上也有一定的难度；而主要以是否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作为断定知识分子的标准，这种标准不仅能较好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增强知识分子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程度的文化专业知识，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是指社会分工、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不普及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阶层。如今已进入“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又主要是指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从中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对比来看，知识分子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侧重于以教育程度来界定知识分子，而西方更多的是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从社会职业的层面来定义知识分子，将教育程度仅作为一种前提条件。比如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任何社会中比绝大多数其他社会成员更为频繁地使用具有普通范围和抽象意义的符号来进行交流

和表达的那群人。这些符号涉及人类、社会、自然和宇宙各个方面。他们更为频繁的使用这些符号，或是他的个人嗜好使然，或是因为职业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① 这里强调的是指具有超越性的符号知识，而不是具体的操作知识。中国以教育程度来界定知识分子简单明了，不必纠缠于那些模糊难定的边际，但不足之处是范围过于宽泛。

“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知识分子成为政策的对象，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并不构成问题，也不存在“知识分子政策”。

在西方，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漂泊、无所依附，同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都不充分整合的群体。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相对独立，一方面以专业知识为谋生手段，另一方面以社会时代的眼睛和良心自居，对社会现状多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们进可以从政，退可以为文或者经商，相对自由独立的学院永远是他们的最后家园。他们在社会上有自己的立足点，用不着统治者来落实什么政策。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或者是其后备军，或者严格地说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他们进可入仕，退可耕读，在社会地位上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因而也就不存在着什么特殊的政策问题。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特殊政策的对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发生的，其实质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近代科技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问题，而其问题的核心则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革命建设领导者的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中国革命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知识分子是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之外的同盟，是“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理论并不能

^①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The Macmillan Company and the Free Press, 1968, p 399.